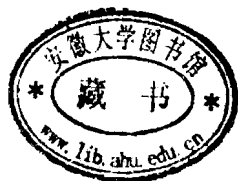


林紅閣經濟史文選

◎ 李運元 著

林紅閣經濟史文選

李运元 著



方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柿红阁经济史文选/李运元著. -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6.3

ISBN 7-80192-739-7

I. 柿… II. 李… III. 经济史-中国-文集
IV. 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0306 号

柿红阁经济史文选

著 者: 李运元

责任编辑: 苏全义

出 版 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 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四川三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42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册

ISBN 7-80192-739-7/F·118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1954~1955 学年,我校率先在我省高校中开设《中国国民经济史》(简称《中国经济史》)课程,在西南地区高校中也可能是最早的。已退休的我校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教研室主任、本师李运元先生就在当时既无教材又缺助手的情况下,独自为我校各专业学生主讲此课。两年后才陆续增加了几位教师。光阴荏苒,于今 50 年矣。为了纪念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经济史》课程开设 50 周年和李运元先生从事本门学科教学、研究垂 50 年之久,我们在李运元先生所写 30 余篇学术文章中选取了 15 篇,独为一册,以付刍荛。

我们以往攻读研究生的专业都是中国经济史专业,从李运元先生治学较久。而现在我们当中有的一直从事本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有的虽未中辍本门学科的研究但已主要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我们深感经济史是深入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必要基础,这又决定于这两门学科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下面我们即就经济学与经济史这两门学科的关系谈点粗浅意见。

第一,经济史是一门边缘性学科,既是历史科学,也是经济科学,但主要是经济科学,它是经济科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它

与经济学(主要指理论经济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学通过经济历史、现状的研究,利用经济史对某些经济事件的考证、分析与对某些问题所作的结论,再作进一步的概括上升为经济范畴,通过经济范畴的分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经济史的研究反过来用经济理论作依据进而揭示某一具体国家的某一历史时期国民经济运动的规律。这一关系是有机的血肉关系。

第二,经济学是横向分析,经济史是纵向论述。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都离不开研究某一特定经济问题。所谓“特定”,对经济学家来说不妨看做是时间位置,对经济史学家来说不妨看做是空间位置。(如地租、价格、利润等范畴都可看成是处于同一空间平面的位置)。在研究中要定这一个“点”,打个比方,经济学解决横座标问题,经济史解决纵座标问题,这种关系是交错依倚的纵横座标关系。

第三,经济学家在理论研究中若出现捍格情况,可在经济史实况研究中寻找新依据以创新论。经济史在论述中碰着新史料、新情况难以阐释,也可在经济学中寻找新论以建新说。两门学科互为表里,这种关系是突破、创新的相互促进关系。

正因为如此,所以经济学家首先应当是经济史学家。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看,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时说:“这个人(笔者按,指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① 因此,有的学者甚至说:“《资本论》一书是一部经济学巨著,同时又是一部最好的经济史。”^② 恩格斯同时也是经济史学家,他强调:“在理论方面还有许多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页。

②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续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① 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等都同时又是很好的经济史。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是经济学巨著,也是一部高质量的经济史。我国过去著名的一流经济学家如王亚南、许涤新、彭迪先、薛暮桥等都同时又是经济史学家。王亚南所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论纲》;许涤新所著《官僚资本论》、《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彭迪先所著《战时的日本经济》、《世界经济史纲》、薛暮桥所著《中国农村经济常识》等书都是经济史名著。当今著名的一流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也同时是经济史学家,所著《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及其危机》、《外国近代经济史讲义》都是优秀的经济史著作。

其次,从西方经济学家看。在西方经济学界早期(亚当·斯密时期),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研究是结合的。19世纪中叶以来二者曾分道扬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二者又趋结合,关键性的重要人物是美籍奥裔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格伊斯·熊彼特(1883~1950)。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基础学问:“历史、统计和理论”,在“三门基础学问之中,包括直到今天为止的事实在内的经济史是最重要的一门”。^② 因此,有的学者说:“能够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两方面都有贡献和重大影响的,熊彼特大概是第一人。”^③ 后于熊彼特的极重视经济史研究的西方经济学家以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最为突出。一位外国学者说:“罗斯托无疑是我们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起飞这个术语成了本世纪中叶词汇中的一个标准名词。没有一个活着的经济史学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② 巫宝三、陈振汉编:《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③ 巫宝三、陈振汉编:《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占据类似的地位。”^① 罗斯托所写《19 世纪英国经济》和影响重大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史名著。这里特别要提到, 罗斯托认为: “经济史学就是在经济理论密切配合下以经济成长为中心课题的‘经济成长史学’。”^②

从 1969 ~ 1993 年的 24 年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 11 位都同时又是经济史学家。值得称述的首先是 1972 年诺奖得主约翰·希克斯。他所著《经济史理论》一书, “以最长的时间跨度和最广的空间跨度, 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必然性, 是将经济史与经济理论融于一体的典范之作”。^③ 其次是 1999 年诺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 “他之所以获奖是由于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这一理论是他在研究 20 世纪初到 50 年代美国农业史中提出的”。^④ 再其次是 1993 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思。他们“运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对更新经济历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因而荣获了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⑤ 福格尔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 诺思所著则有《西方帝国的兴起》和《经济史的结构和变革》等。

这种情况, 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 “获得当代经济学最高成就奖(笔者按, 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大都得益于采用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方法。”^⑥

① 胡代光、厉以宁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284 页。

② 厉以平:《新经济史学的启示》,《经济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③ 《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选》, 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9 页。

④ 《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选》, 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70 页。

⑤ 本报驻北欧记者桑洪臣:《新经济历史的先驱——记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福格尔和诺思》,《光明日报》, 1993 年 12 月 4 日。

⑥ 《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选》, 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6 页

近年来,中国经济史这门学科“受到冷落”,表现在以下一些现象,如:“出版物虽多,读者却有限”;“经济史期刊也销路不畅……读者就是作者”;经济史“学年课改为期课,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招经济史研究生经常断档”;“经济史毕业生留不住”^①等等。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经济学与经济史的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认识不够。我们选编、出版这一本《柿红阁经济史文选》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呼唤人们对中国经济史这门学科的正确认识和重视。

我们选编这本《柿红阁经济史文选》所掌握的尺度就是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所提出的:“至少必须三‘新’有其一。”^②《柿红阁经济史文选》中的15篇文章,计:经济史理论方面4篇;中国古代经济史方面8篇;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3篇。显然,中国古代经济史是李运元先生研治的重点。

在选编《柿红阁经济史文选》过程中,我们深感李运元先生在研治中国经济史方面有一些值得重视之处。其一是力求不“就中国论中国”。^③《柿红阁经济史文选》所收《延续性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属性》一文所得的结论之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出现于战国,就是通过对西欧14、15世纪经济的细致研究和与中国经济的对比作出的。再如所写《中国封建制小农经济

①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② 严中平指出:“我认为称得上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至少必须三‘新’有其一。这就是,或者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提出新的观点,或者提出新的材料。”此说深得学界称许。见所著《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③ 严中平提出研治中国近代经济史必须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不能就事论事”。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同行专家多首肯其说。笔者按,对中国古(现)代经济史的研治,严说也完全适用,即“不能就古(现)代论古(现)代”。

的波动性与回旋性》一文更是与西欧封建小农经济比较研究后总结出其特征的。这也反映李运元先生对外国经济史的重视和比较熟悉。其二是力求对所引史料不“曲解引伸,主观臆断”。^①李运元先生对来自古籍的史料的理理解特别慎重,如《柿紅閣經濟史文選》所收《“美金”、“恶金”辨》、《西周农事诗“噫嘻”篇解》、《释牢盆》等文都是经过博览归注、精密考证从而才提出不同于传统归说的崭新见解。这也表明李运元先生在古汉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功底比较深厚。其三是不“就事论事”。^②《柿紅閣經濟史文選》所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一文,不是仅仅引用一些史料勾画出边区公营工业轮廓的泛泛之作,而是通过全面论述边区公营工业从而指出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创建社会主义公营(国营)工业的经验,其目的在于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目标高远从而本文的意义、价值也就不同了。这也显示李运元先生“以论带史”、“论从史出”的优良治史风范。

以上几点值得重视之处,对某些刚从事本门学科教学、研究的青年同志是不无裨益的。

再,先生亦擅词章,所作旧诗惜未存稿,能忆及者凡四十七首,为附录于后。

限于水平,我们在选编《柿紅閣經濟史文選》和撰写本文中难免有所失误,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①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第64~66页。

② 严中平提出研治中国近代经济史必须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不能就事论事”。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同行专家多首肯其说。笔者按,对中国古(现)代经济史的研治,严说也完全适用,即“不能就古(现)代论古(现)代”。

胡小平(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赵 磊(《经济学家》杂志编辑部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方健(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长、教授、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2005 年 9 月

目 次

试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兼评孙健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

延续性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属性 25

浅议“农业资本主义萌芽”

——兼谈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 33

“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指什么？ 50

中国封建制小农经济的波动性与回旋性

——中国与西欧封建制小农经济比较研究中的一点体会
..... 61

有关封建生产方式产生在周初的几个问题

——与傅筑夫先生商榷 76

西周农事诗《噫嘻》篇解 97

“美金”、“恶金”辨 104

怎样认识战国时期突出发展的商品经济 106

释“牢盆” 120

西汉理财家桑弘羊生年和入仕指误 123

赵德馨教授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主要贡献——商品

货币经济在西汉时期由繁荣转向衰落的科学分析 126

试谈山西票号的性质 13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144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业 181

后 记 221

试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

——兼评孙健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国民经济史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目前国内虽有不少高等学校已开设中国国民经济史以及外国国民经济史等课程,但课程的内容与组织结构,则不无差异,大家在摸索中所获得的经验还不多,取得的成绩并不大。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大家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还不够明确。假如经过讨论,我们能及时地把这门科学的对象确定下来,那这门科学的内容、体系、方向等问题也将会随同解决。这样,才不会影响这门年轻科学的成长,同时,在教学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也将会减少一些。

孙健同志在“国民经济史的对象、方法和任务”^①一文中对这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某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同时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生产或生产方式;孙健同志启示、鼓舞大家对本问题的注意与讨论,这是很好的,但孙健同志的论点,我觉得还有商榷的必要;在党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下,我也愉快地来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粗浅意见,请孙健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① 见《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第1页。以下凡引孙健同志的文章,均见该文。

一 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但主要是生产关系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研究的对象,确定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明确在客观的复杂的世界现象中,这门科学所要考察与说明的是哪些现象?所要说明的世界现象的质的不同与量的差异,就使各门科学互相区别开来,不容混淆、代替。

世界现象可分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大类,因此,研究世界现象的科学也就大体上可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国民经济史是一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我们如何来规定这门科学在社会现象中所研究的范围呢?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又如何确定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确定一门科学的对象,必须从这个问题着手,这样,我们最后作出的结论才有科学根据,也才有说服力。孙健同志认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为什么国民经济史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孙健同志只是举出了生产力不应列入国民经济史对象的三点理由(这三点理由能否成立,还须经过讨论才能决定,我对这三点理由的意见,留待本文第二部分来说明),几乎完全没有从正面阐述、分析这门科学的对象应该是生产关系的原因;我们不能说,因为生产力不应该列入这门科学的对象,因此,这门科学的对象就必然是也应该是生产关系。

然则,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又如何来确定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我认为应该从国民经济史这一门科学的性质与目的性进行分析,确定其研究对象。

先就国民经济史的性质来看:

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新的科学门类不断地从原有少数门类中分化出来。历史学是一门比较古老的科学,远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已存在;而政治经济学则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与确立也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这时还没有经济史这门科学,但在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却都包含有经济史的内容。历史学中包括有很多有关经济发展的历史,政治经济学中为了论证其中的论点,也引证了不少经济方面的史实。17世纪末、18世纪初,经济史才开始从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逐渐分化出来,资产阶级经济史学的开山祖师是法国的羽厄特·皮耳丹摄尔,他在1716年出版的《古代商业史》一书,这是一部比较定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史著作^① 19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均已成为真正的科学并迅速发展,但直到本世纪末的1890年,恩格斯尚叹息地说:“经济史还只在襁褓之中呵!”^② 至于专门考察某一个特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民经济史的出现,则为时更晚。

国民经济史既是从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科学,因此,就其性质论,这是一门历史——经济科学^③,这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国民经济史是一门具有两重性的科学,既有历史科学(这指狭义的历史科学,即历史学以下同)的性质,又有经济科学的性质;就其所描述的是按年代次序的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它与通史、政治史等一样,同是历史科学,就其所揭示的是社会发展中的经济规律看,它与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一样,

① 参克拉判:《论经济史的研究》,连士升译,《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8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487页。

③ 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苏联国民经济史教学大纲(初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同是经济科学。

历史科学在考察世界现象的范围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说是最广泛的。这由于统一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所构成,它是一幅丰富而多彩的图画,不从这个统一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历史科学就不能完成它从复杂的现象中恢复个别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代表性特征的使命。当然,这也并不排斥历史学家着重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定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但无论如何,任何一门历史科学都必须以这一统一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与总的社会现象作为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任何一门历史科学(通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将无从进行研究,也将不成其为历史科学,因此,总的说来,“历史科学的对象,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社会生活现象的总和”^①考察范围的广泛性与考察方法的具体性,是一切历史科学的共同特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社会生活都是发展的,决定社会生活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什么?那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这即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生产方式,统一的历史过程首先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愈是扩大,人类的历史更是愈加完满地成为人类的历史”^②;所以,任何一门历史科学在所考察的社会生活现象总和中,都离不开对反映生产力方面与反映生产关系方面的现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考察,但国民经济史这门历史科学所要考察的,则主要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现象(对上层建筑的现象以及其他既不属于基础又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现

① 《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史科学”,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 5 卷,第 285 页。

象也要适当考察);这样,我们说,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国民经济史同时又具有经济科学的性质,经济科学所考察的世界现象的范围远较历史科学狭小,它并不研究整个统一的历史过程,“只研究历史过程所展示的整个现实的一个方面”^①;一切经济科学都以从理论上揭示、分析经济规律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都以研究社会经济制度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因此,“任何经济科学研究的都是人们的生产关系”^②。譬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各个不同阶段上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部门经济学所研究的则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关系在某一物质生产部门内发展一般规律所表现的具体形式。经济科学的这一共同特点,决定了国民经济史在考察社会现象时不但不能抛开生产关系,而且还必须着重研究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史对一定国家生产关系的研究是主要的,对与生产关系联系密切的生产力的研究是次要的。为什么国民经济史一定要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部分呢?第一,国民经济史是要揭示、分析经济规律的。社会生活中,固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依赖性,但要把这些内在联系揭示出来,则必须深入到经济生活的底里,通过历史材料予以抽象的逻辑分析,所谓“底里”就是指生产关系,在揭示经济规律上,科学认识之所以和表面观察不同,是因为它深入到某一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的实质,并揭示其发展动力。第二,由于国民经

① 约翰·伊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译丛》,1957年第2期,第1页。

② 勒·伊廷:《关于部门经济学的对象》,摘译见孙耀君编译:《苏联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第146页。另外苏联学者罗孟钦可与赫罗莫夫都与伊廷持同样论点,参见该书第141、153页。

济史要揭示经济规律,因而这一科学在内容上除要描述确切的历史过程外,还要更加着重理论分析。这是国民经济史与其他历史科学如通史、政治史等不尽相同之处(这里不是说通史等历史科学就不需要理论分析,只是对国民经济史加以强调而已),在理论分析上,必须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各阶级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等问题来进行,离开了这些根本问题,则所谓理论分析将会空洞无物,一句话,就是要把一些社会生活现象归结为生产关系进行分析。只有这样,一部国民经济史才不是一篇流水帐,才是一门有血有肉的,既有史实依据又有理论分析的科学。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中既有生产力也有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是主要的。

国民经济史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这一论断,我们从这门科学存在的目的性的分析中也可得到论证。

国民经济史之所以又能从经济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在客观上是有其存在目的性的;总的说来,这门科学的目的性就是揭示、研究某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与特点。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国民经济”一词,“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国家“全国生产(包括工业、农业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总体”^① 国民经济史所要揭示与研究的也就是某一国家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一经济总体发展的具体过程与特点。

在“国民经济”这一总体中,虽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

^① 中国人民大学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词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02 页。